

权势转移：“五四”进步社团 生成逻辑的取向及意蕴*

汪 兵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2)

[摘 要]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过程中,文化与政治向来具有紧密的关系,思想演化和学术发展也是与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揭示了社团组织和社会变迁关系的逻辑起点。因此,社团组织是深刻折射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因子。权势转移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视角,运用权势转移视角考察“五四”进步社团生成逻辑的取向,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思想权势的取向,主要是从近代中国“主义”传播维度审视进步社团的创建;二是组织权势的取向,主要体现于戊戌变法以来中国近代社团组织的不断演进;三是社会权势的取向,主要呈现于中国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代际传承”的过程。整体审视,这三个方面的取向内容可以归结为权势转移在中国近代社会公共领域的传递和嬗变。思想权势从观念层次上对组织权势和社会权势起着引导作用,社会权势凸显文化要素在思想权势和组织权势层面的渗透过程,为五四运动以后“社会改造”的探索奠定基础。考察“五四”进步社团生成逻辑的取向及意蕴,不仅呈现出“社会改造”探索的支撑力量,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组织样态提供新解释。

[关键词]权势转移 “五四”进步社团 生成逻辑 意蕴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983X(2026)04-0027-09

权势转移是思想史研究的视角。所谓“权势转移”,主要是指在社会文化网络中,个人或组织所拥有的权力及其影响在公共空间领域的传递。就近代中国而言,从19世纪后期至五四时期,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逐渐发生了松动,从传统王朝体系的社会结构衍生出具有中国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性质的社团组织。罗志田认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学术和社会变化随权势而转移,社会变迁的权势则表现为国家的政治重心所在,并且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是相伴而生的”^{[1](P21-22)}。这就要求研究者“更多地关

注‘五四’发生的社会环境及其演化意义,特别是要着力研究‘五四’不同群体的行为差异及其后果”^{[2](P16)}。“五四”进步社团研究是值得学界重视的传统学术领域。目前,学界关于“五四”进步社团生成逻辑研究的代表性观点,大致包括:“五四”进步社团的生成主要是源于“中国近现代文化的转型”^{[3](P252)};“五四社团的崛起实是政治与文化交相发展的产物”^{[4](P64)},它还“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产物”^{[5](P6)}。整体来看,这些代表性的观点都是把“五四”进步社团生成看作是中国近代思

收稿日期:2025-09-10;修回日期:2026-05-05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中共创建时期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基础的历史考察”(2023AH040328)

作者简介:汪兵,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想文化发展的产物,但缺少从思想史的视角进行审视。基于此,为深化“五四”进步社团生成研究,本文拟运用权势转移的视角就进步社团生成逻辑的取向及意蕴作出考察。

一、思想权势:近代中国“主义”视域中的进步社团

近代外来的“主义”思潮,往往成为思想史的主题,但又常常超越“思想”本身。1840年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摆在中国人的面前。到19世纪后期,随着西方新文化和新思潮大量传入近代中国,“主义”思潮成为西方新文化和新思潮传播的集中体现。“主义”不仅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还通过多种媒介进行运作和传播。社团组织成为“主义”传播的重要载体。组建社团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优先选择。

(一)近代中国“主义”思潮的递嬗

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也随之展开。从学理层面看,启蒙既是历史现象,也是文化现象。士大夫们尤其是晚清地主阶级的改良派从近代中国的认识出发,希望能运用政治变革的方法寻找国家出路。诸如,关于政治制度改革的内容,士大夫们认为可以效仿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在处理中西关系的问题上,可以将封建王朝体系和西方文化进行融会贯通。不过,随着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晚清的有志之士深感仅仅向西方引进器物技艺和进行政治变革仍旧是远远不够的。西方的“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日渐被重视起来。一时间,“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思想都汇集到了中国,空想的、科学的,有人物介绍,也有思想介绍,应有尽有”。^{[6](P6)}特别是随着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深刻变迁,国内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潮出现了。到20世纪初,中国人在介绍日本著述时受到日本学者对“主义”使用的影响,特别是留日群体对社会主义研究的译作贡献很大。例如,1901年1月,

创刊于日本东京的《译书汇编》多次刊文提到了“主义”“社会主义”等词汇。^{[7](P172)}

民国初年,西方的价值观逐渐被国人所接受,因而“主义”思潮在辛亥革命前后进入新的传播阶段。当然,这时候宣传和谈论“主义”的范围仍限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群体。同时,这个时期还是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阶段。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成为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变成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中介条件。但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五四运动后开展的“主义”论争,使进步社团意识到无政府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的主要目标,本质上就在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无产阶级专政,并初步分清了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实质区别。

这个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反映了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的主张,诸如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迷信和专制,提倡西方文学,废除文言文等。这些体现于中国近代社会领域的新变化,对五四运动前后的“主义”传播和进步社团创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义”和新思潮争相登场,逐渐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大场景。具体来看,“主义”思潮的传播需要借助媒介组织,人们为了宣扬所信仰的“主义”,就需要借助包括报纸、期刊、书籍、社团等在内的现代制度性媒介。在这样的情形下,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社团组织,成为中国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宣传和传播“主义”的有效载体。对“主义”的审视和运用会发生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衍化情形,可能还会出现以研究者的主观意志代替前人研究的结果之本意,甚至使用后设的研究框架来裁剪“主义”传播的客观进程。因此,这就需要研究者严格依照时间和空间联系的顺序,来探求近代中国“主义”派别的演进和发展的轨迹,将近代中国“主义”派别的呈现和运行尽量还原为先前客观的历史事实。不过,“主义时代”的来临和呈现主要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因为,“五四运动是思想解放运动,

一解放，就象大水奔流”。^{[8](P10)}这不仅主要表现在“主义”传播的规模和程度上与之前的各个阶段相比有着深刻的变化，而且，体现在进步社团和进步报刊等新式的现代制度性媒介对“主义”派别的宣传达到了新的高潮。有研究者就以互助社的主要发起人恽代英为个案，具体考察恽代英是如何从沾染过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而逐渐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就是说，五四运动以后，恽代英虽是中国传统政治道德的践履者，但“当恽代英意识到要以‘主义’代替‘良心’时，他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选择何种‘主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在各种‘主义’中徘徊，最终慎重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9](P433)}。

（二）进步社团承载“主义”的传播

中国近代新式知识分子通过组建各类型团体，积极开展社团活动，积极探讨时事和交流思想，关注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总之，这对当时的“主义”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渐趋高涨，多数的进步社团都秉持以“社会改造”的探索为宗旨。这就是“五四”进步社团及其刊物言论主题的时代背景。中国近代的新式知识分子发起或积极参加进步社团，并依托社团交流思想和传播新文化，成为新的潮流和时尚。进步社团“以积极的精神，于时代的轨道上自动的为种种组织，依社交的手段，作学术上和行为上的种种修养”^{[10](P89)}。当然，社团组织还因为主张或信仰“主义”的不同而导致性质、宗旨各异。一方面，西方的新思潮大量涌入中国，日益为国内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所接受；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内生性、封闭性和悠久性，使得它对西方思想文化具有排斥性。但进步社团“在思想、宗旨和组织制度方面都有不少较之封建时代进步的地方”^{[3](P231)}。

西方的“主义”和学说被大量地介绍到国内以后，这引起了有志青年们的兴趣和热捧。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主义”派别都成为社团组

织和报刊讨论的重要话题。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还深刻意识到，要想彻底改造中国社会确需要一个过程，“决不是一两年的时间，更不是一两人的力量所能办到”^{[11](P91)}。尤其“‘主义’是在五四时代社会改造思潮中崛起的，不仅契合‘社会改造’话语演进的内在要求，而且‘主义’本身亦成为五四时期思想界的显著标识”^{[12](P102)}。因此，在五四运动以后“主义时代”的境遇下，全国逐步出现了一批宣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社团和进步刊物，诸如，1918年4月，毛泽东等人在湖南创建了新民学会，随后创办了进步刊物《湘江评论》；1919年7月，王光祈等人在北京正式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并出版了进步刊物《少年中国》月刊和《少年世界》月刊；1919年9月，周恩来等人在天津成立了觉悟社，并出版了进步刊物《觉悟》；1920年初，王尽美等人在山东成立了励新学会，并出版了进步刊物《励新》半月刊。当然，“五四”进步社团的发起人或参加者并不仅参加一个社团，往往组织和参加过数个进步社团。诸如，毛泽东发起创办和参加的进步社团主要就有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和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等。不过，为什么会出现跨社团的现象呢？这些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初步摆脱传统旧式士大夫政治思维的束缚，尤其是逐步祛除关于“君统”和“道统”的双重负担，大体跳出“代圣贤立言”为行事作文基准。进步社团成员施存统认为：“第一步，巩固团体基础，一种是独立的技能，一种是专门的学识；第二步扩张我们底团体，实行主义的宣传；第三步，联络各处同志，结成一个大团体，实行世界革命。”^{[13](P78)}因此，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对新文化运动中信仰出现危机的情形而转向创建进步社团来传播国内的“主义”派别，以改造社会和实行革命。总之，“五四”进步社团不仅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产物，而且成为深入推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新因子。

总之，“主义”派别都来自域外世界，并伴

随着西方的新文化和新思想涌入中国,不仅有西学中学的区别之分,还有不同的宗师流派之别。这就不能不深入探究“主义”派别的引入与传播及其演化的进程,也不能以后来主观定义去指认自以为是的史事,而必须提供何以如此审视的经过清洗的历史史料以及证明的过程。“五四”进步社团生成既是20世纪10年代现代国家建设危机的体现,也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过程的产物。这既是“主义”在传播过程中呈现权势转移的产物,也是“五四”进步社团承载“主义”派别嬗变的结果。

二、组织权势:晚清以来中国近代社团组织的演化过程

传统士大夫阶层在1895年之前还是停留于传统中国的思想世界里,但1895年后转向了“正视外来的西学的意义和价值”^{[14](P512)}。这主要基于三个因素的考量,即“一、旧书院的改制和新学堂的设立;二、学会的设立;三、由士绅阶级所主办的报纸”^{[14](P512)}。其中,创办“学会”是甲午战争后流行于传统士大夫群体中间的新风尚,成为中国近代社团的肇始。至五四时期,这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近代社团处于承上启下发展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五四运动前后,中国近代社团创建逐渐走向高潮的阶段。

(一) 辛亥革命前后的社团组织

近代中国社团组织的出现,严格说与维新运动的发生有着深刻关联。而且,鼓吹维新运动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从中国的传统士大夫转变而来的。无论是作为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还是作为中国社团史的一个分支,还是作为中国近代政党的基本源头,都需要提及具有社团组织性质的各种“戊戌学会”。1895年,维新派创办了北京“强学会”。梁启超指出,“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教之惟何?惟一归之于学会而已”。^{[15](P553-555)}总之,“成立于1895年的学

会有4个,成立于1896年的学会有5个,成立于1897年的学会有20个,成立于1898年的学会有38个,可谓逐年增多。”^{[16](P19)}

特别是1903年以后,晚清政府推行了自救改革措施,中国近代的“学会”(或社团)发展再次呈现蓬勃之势。民国成立以后,随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遭受挫折,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远离政治斗争,转向创办具有新式知识分子性质的社团组织。在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内容中,就包括民众享有集会、结社之自由等相关规定。因此,创建社团组织成为民国群众所享有的政治权利。虽然,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政客官僚在民国初期是以组建政党为时髦,同时还一度以建立社团组织为时尚和热潮。当然,关于如何寻求乱中求治、分中求统就成了一些社团组织重点关注的主题。当时,谋求统一的政团很多,诸如或求民族统一或求南北统一或求地方统一。到1913年底,这样新成立的公开党会(或政团)共计大约有682个,其中“政治类312个,联谊类79个,实业类72个,公益类53个,学术类52个,教育类28个,慈善类20个,军事类18个,宗教类15个,国防类14个,进德类9个,其他10个”。^{[17](P32)}因此,辛亥革命前后社团组织的概况不但数量较多,而且,社团组织的种类也较为庞杂,有些社团组织还兼具多个性质,并不能够细致归类。同时,一部分重量级人物和政治势力把组建党会(或政团)作为扩大影响力、捞取政治资本、实现政治目标的主要途径,但多数社团组织都积极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而且,按照性质宗旨和活动内容不同,辛亥革命前后的社团组织大致包括“一般政团、军事团体、文化教育团体、风俗改良团体、农会、妇女团体六大类”^{[3](P250)}。这大体体现为:其一,在社团的发起人和成员方面,多数都是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党中要人,民初政党纲领大多通过社团组织来实施;其二,社团组织的指导思想和宗旨纲领往往受到西方政党政治观念的影响比较大,进而社团组织大体都有较完整的规章制度,社团组织的运

作程序和流程比较注重民主性,社团组织的成员也有着明晰的定位和角色等。

辛亥革命前后的社团组织在推动社会转型和促进社会改良等方面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些社团组织常是游离于社会体制之外,并带有自发性、独立性和现代性的特点。但一部分的社团组织(或者说政团)却徒具虚名,其中的主要发起人一心想着为私利挂着空招牌,而没有进行有益的活动,或纯粹沦落为服务于政治派系斗争的工具。民国初年,社团组织与政党时代命运休戚相关,“所以,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化的转换过程中,社团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4](P58)}。但随着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在民初政治斗争中逐渐失势,以及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反动势力对社团组织进行打压和取缔,社团组织的功能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

(二)“五四”时期的进步社团

经过五四运动的鼓舞和推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愈发认识到所肩负的重要使命,由此促使“五四”进步社团创建逐步得以繁荣。整体而言,这个时期近代中国结社高潮的出现是多个因素共同影响和共同作用的产物。这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审视: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和“一战”以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步觉醒;另一方面,在报刊上宣传“主义”的往往就是进步社团的发起人。空前活跃的新式知识分子发起或参加进步社团的活动,既夯实了中国现代科学和文化发展的基础,也为中国现代政党的新生提供了条件。

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进步社团概念的含义就有了逻辑前提。狭义上的社团,主要是指具有相同兴趣和单纯喜好群体组成的具有稳定关系的组织;广义上的社团,则是指基于一定社会目的或利益目的履程序而获取资格的团体组织。如果把这两个方面的定义综合起来考察,就不仅指明了“五四”社团概念的基本含义和重要作用,而且可以直接把进步社团和社会集团、政党、政团等组织区分开来。因此,

“五四”进步社团的概念,主要就是“既包括有

一定组织程序的进步社团,如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利群书社、国民杂志社、工读互助团、改造社、励新学会等,也包括以杂志为中心、由相对稳定的作者群体形成的进步社团,如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等”^{[5](P2-3)}。而且,对光明的憧憬和未来的向往,是弥漫在五四运动前后进步社团成员心中的重要基调。随着中国近代社会新的经济形势以及新的思想意识逐步产生,新质因素又成为催生中国近代社团组织的重要条件。这个新质因素就是“五四”进步社团试图打破狭隘的层级观念,建立超越性和地方性的思想聚合,并希冀以合群的方式进行阶级动员,以最大程度动员广大民众而达到救亡图存的效果。“从这一点来说,中国人向国外学习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由洋务时期的科学技术和自然科学、戊戌——辛亥时期的政治学说,发展到了五四时代的思想文化。”^{[4](P264)}虽然,“五四”进步社团的宗旨目标各有不同,但五四运动以后多数进步社团都主张要以“改造社会”为宗旨和目标。总体来看,“五四”进步社团不同程度地参与和推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唤醒广大民众以及改变社会风俗等方面都发挥了作用,并成为这个时期“主义”的宣传者和传播场。不过,受制于各种条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宣传的各种“主义”,其内容也极其庞杂。比如,社会主义的流派就不仅包括科学社会主义(也即人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还包括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新村主义以及基尔特社会主义等。而且,“五四”进步社团以及报刊大都喜欢讨论和宣传社会主义,没有不谈论社会主义派别的。在此情况下,马克思主义逐步被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所认知和接受,成为引领和指导中国发展的旗帜。

因而,“五四”进步社团的“进步”含义,可以用来指称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的人物和事物。实际上,这不仅体现在流行于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反传统主义”现象,而且还表现在这些先进知识分子对于新潮流或新事物

的欢迎和接受态度。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不仅对落后、循环和复古的历史观念作出了深刻批判,而且还要把进步观念确立为中国近代思想的主要精神传统。同时,“进步”概念的意义既与社会现代性的发展有着重要关联,又指向理想社会的目标以及凸显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这样,“进步”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意义凸显出“始终与现代社会生活的不断变革保持着紧密的联系”^{[18](P118)}。因此,从组织化角度来说,“五四”进步社团的生成成为权势转移在社会结构中的深刻体现和不断延伸。并且,进步社团还成为五四运动之前“文化革命”选择转向五四运动以后“社会改造”探索的载体。

三、社会权势：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代际传承”

罗志田指出：“从社会方面探索思想和政治演变的造因，并反观思想演化对社会变迁的影响。”^{[1](P163)}中国古代的社会重心，主要是指处于社会结构之首位的“士”的阶层。但从社会变迁的维度进行审视，“思想权势的转移作用于社会，就产生了废科举兴学堂等教育改革”^{[1](P3)}。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关于近代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研究的焦点之一，是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代际传承问题。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代际传承”的划分，所“依据的并不仅是生命的自然事实，必须考虑到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历史事实”^[19]。当然，从中国近代社会的进程来说，这个新式群体主要体现于传统士大夫的消失以及“边缘读书人”的出现。

（一）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初步形成

五四运动前后，所谓的“新”与“旧”、“中”与“西”等关系论争的焦点，大致可以归结为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化以及新社会结构的初步形成。实际上，思想权势的转移往往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密切相关。因而，这种基于情感和态度的思维认知，或者说运用情感判断取代价值判断的方式，也正是中国近代新式

的知识分子群体代际传承行为的深刻体现。

“近代中国最大也最显著的权势转移，当然是共和取代帝制的巨变。”^{[1](P1)}自1905年清末废除科举、实行新学以来，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近代的新式学校和教育机构纷纷建立。科举制度的停废争议和近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思想观念的整体变化处于互相推动的逻辑关系。中国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涌现，一方面根源于废除科举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另一方面源自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出现。这表明“达到传统文化的既定价值目标所需的工具性连环已经破碎，政治系统与社会精英的传统联系已经割断”^{[20](P218)}。在传统士大夫阶层向现代知识分子群体转变的过程中，新式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规模日益扩大以及知识结构和认知背景的不断更新，加快了中国政治系统与社会精英传统联系的割断，导致社会结构出现裂变。

近代中国逐渐成长起来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对社会政治等的参与感要比其他许多群体更强”^{[1](P212)}。特别是经过新文化运动的助推，国内的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稳步发展，促使平民教育和实用主义教育等思潮盛行，并初步建立了近代中国的教育体系。同时，五四运动使得进步社团看到了广大民众的集体力量，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在结成进步社团以后，就把新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象聚焦于普通民众。比如，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通过开展各种活动以启发民众的政治觉悟。李大钊不仅指导该进步社团开展北京城里的反帝反封建宣传，而且还鼓励该社团把活动范围扩大到京郊的工厂和农村，将社会情形“作我们改造社会底参考”^{[21](P18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五四”进步社团成为社会政治参与的重要力量。

虽然，五四运动前后活跃着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或者说边缘读书人逐渐集聚起值得注意的舆论影响和行动能量，甚至最后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趋向和走向。因此，“五四”进步社团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凸显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和思想演化的必然性。社团组织作为“五四”社

会现象的重要表征,主要根源于新文化运动期间提倡人的个性解放,又与五四运动以后呼吁和掀起“社会改造”的探索紧密相关。这就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过程在“五四”进步社团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取向上的直接反映。

(二)五四时期的“两代”知识分子

许纪霖把“五四”知识分子群体的“代际传承”,大致划分为“启蒙知识分子、旧派中的新派、新派中的旧派”三个部分。但这还可以划分为两个小的群体:一个小群体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属于“师长辈”角色的杰出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另一个小群体则是由大学生和中等学校学生所构成的“学生辈”的优秀青年,如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等。与传统的士大夫相比,新式知识分子的群体对传统文化、社会角色、国内政情、自然科学等方面都有着很好的认知和理解,而且,一部分知识分子因为源自中下层社会,甚至成为游离于民初社会结构之外的自由职业者。因此,五四运动前后,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已从现代知识体系的分类以及细化的社会分工角度来考虑和选择志向与志趣。

近代新式知识分子性质和色彩的社团活动,推进了五四运动以后思想文化领域运动的展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对民初局势进行反思后,呈现出从“不谈政治”到“谈政治”的转变。究其原因,这大致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第二卷改为《新青年》),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在陈独秀看来,《青年杂志》的创刊主旨就是要开展“思想革命”(也就是要进行“文化革命”)。因而,该杂志明确要阐发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礼教、反对旧伦理道德等问题,提倡白话文和实行文学革命。以《新青年》杂志的编读往来为中心,逐步形成以陈独秀为主帅,前期以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鲁迅等人为核心,后期以李汉俊、李达、陈望道、袁振英、沈雁冰等为核心的《新青年》群体——我们称之为新青年社。夏衍回忆道:“《新青年》《解放与改造》这些杂志,不仅

在青年中间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而且还逐渐的把分散的进步力量组织起来,形成了一支目标比较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队伍。”^{[23](P731)}正是在《新青年》杂志的影响下,除了傅斯年、罗家伦创办的《新潮》以及许德珩等创办的《国民》外,还有王光祈发起创办的《少年中国》、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周恩来创办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等。其二,五四时期,政府新闻舆论力量的包容。这主要表现为新闻舆论的宽松和“大一统政权的分化”^{[3](P362)}。除了北洋军阀控制的反动报刊以外,诸如国民党、研究系控制的报刊、外国在华主办和控制的报刊以及民间私人创办的报刊,都对新文化运动有着不同程度的包容和支持。例如,五四运动前后,“晨报系”的报人群体“在权力规训和职业理想之间的抗争与权变,也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权势更迭和思潮演变提供了历史样本”^[24]。总之,新闻界所宣扬的新思想和新思潮的进步言论,不仅深刻启发了进步社团成员,而且,还与所创办的进步社团及其刊物遥遥呼应。这既包括作为办刊者和编撰者的《新青年》同人的重视,更展现为《新青年》读者群代际的文化表征。

虽然,“边缘读书人”在加入进步社团之前大多是以个体形式存在,但经历了社团活动之后,必然形成大大小小的社会权势关系。并且,中国是讲究关系的传统熟人社会,个体发展离不开所建立的权势关系网络。从另外角度来看,社会权势的网络建构对进步社团的发展是有深刻影响的。中国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呈现的“代际传承”现象,对透视五四时期“两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取向也是适用的。林毓生把近代中国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即戊戌维新时期)和第二代知识分子(即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共同思想倾向,大致概括为在“社会政治条件”基础上的近代新式知识分子擅长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25](P48)}。不过,这种逐步形成于进步社团权势转移过程中的共同情感极易产生,但其实极为脆弱和存在弊端。

这样来看思想权势和社会权势的内在关系,既表明五四时期新思潮和新文化的深入传播既需要依赖于社会结构,又阐明社会权势是以文化权势的内容呈现为基础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并不死守陈旧的教条,一旦时机和条件成熟,就会重视政治主张和集体行动。这深刻表明了“五四”进步社团呈现反儒家思想以及“反传统”的社会革命之意义。

四、内蕴意蕴:“五四”进步社团生成逻辑的整体审视

从整体上审视“五四”进步社团生成逻辑的取向,无论是“思想权势”的转移,还是“组织权势”的转移,甚至是“社会权势”的转移,其实都可以归结于社会公共领域的文化网络嬗变。文化作为观念的形态,是服从和服务于现实政治的。“近代中国人面对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多种矛盾交织的复杂局面。”^{[26](P13)}这迫使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着手从文化转型的视域谋划国家出路,寻求能够找到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新道路。五四运动前后,进步社团更是把政治与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还试图通过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在表现形态从而达到拯救民族国家命运的目的。因而,“五四”进步社团生成逻辑取向的意蕴,大致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西方“主义”在近代中国传播过程中所需要依托的组织载体,主要表现为权势权力在模式化结构中的演化和嬗变,“从出场逻辑上看,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得以快速传播并展现出真理魅力”^[27];另一方面,是立足于非模式化权力结构中的权势关系扩展和复调,主要体现于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代际传承”。

“五四”进步社团对“社会改造”探索的知识体认,并不是要运用“国家与社会”范式进行学理审视,而是基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践使“社会改造”作为社会革命的方式逐渐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了解和接受。这让中国先进

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仅仅停留于讨论抽象的“文化革命”毫无意义,必须把救亡图存切实转向改造社会层面。因而,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救国救民的方案,包括西方“主义”学说在内的新思潮和新思想日渐涌入国内。同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进程的根本主题。不论是“主义”的传播,还是探索“社会改造”,其实都是围绕这个根本主题展开。这也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创建进步社团提供了机会和条件。五四运动以后,伴随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阶级观念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作为“边缘读书人”的青年知识分子逐渐成为进步社团创建的主要班底。并且,进步社团的革命观念传递也比其他群体更为顺畅和频繁,进而在互动中也会形成更深层的关系。虽然,“社会改造”的探索表明了进步社团宗旨演化和组织发展的趋向,但“五四”进步社团都是以“学会”“社”“研究会”等名称公之于世,实质上都可以视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组织样态。比如,1920年5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成立后就组织讨论“社会改造”等。该社团的成员陈望道回忆说:“我们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要彻底改革旧文化,根本改革社会制度,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28](P52)}基于权势效能的存在,权力不应仅作为组织或集团的所有物,而要作为权势关系网络出现的策略。因此,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过程,深刻表明了权势转移视角下“五四”进步社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参考文献:

- [1]罗志田. 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
- [2]杨念群. 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 [3]刘健清. 中华文化通志·社团志[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 [4]曲广华. 中国近代文化与五四社团[M].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4.
- [5]黄爱军. 五四进步社团与中共创建关系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 [6]杨慧清. 五四时期的抉择[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6.
- [7]王先俊. 清末民初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M].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 [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五四运动回忆录(续)[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 [9]忻平, 徐建刚, 陈挥. 起航[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
- [10]张卫波. 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主阵地[M]. 北京: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1.
- [11]张允侯, 殷叙彝, 洪清祥, 等. 五四时期的社团(一)[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 [12]吴汉全. 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在中国的建立——基于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的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13]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 觉悟渔阳里: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料选辑(上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 [14]王汎森.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 [15]中国史学会. 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 [16]范铁权. 近代中国科学社团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 [17]张玉法. 民国初年的政党[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4.
- [18]高瑞泉. 动力与秩序: 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与转向[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 [19]邓金明. “五四知识分子”与知识共同体——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考察[J]. 学术月刊, 2011(5): 139-146.
- [20]许纪霖, 陈达凯. 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5.
- [21]张允侯, 殷叙彝, 洪清祥, 等. 五四时期的社团(二)[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 [22]许纪霖. 前浪后浪: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25.
-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五四运动回忆录(下)[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 [24]郑思源, 付登舟. 民国时期“晨报系”的迁流考察(1916-1937)[J]. 深圳社会科学, 2026(1): 130-139.
- [25]林毓生. 中国意识的危机: “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增订本)[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
- [26]彭明. 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 [27]车宗凯.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认识与接受[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5(3): 84-95.
- [28]吴德刚. 伟大建党精神: 孕育与形成[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4.

【责任编辑 史 敏】

Power Transfer: Orientation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Formation Logic of Progressive Societies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ANG Bing

Abstract: In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culture and politics have always been closely related, and the ideological evolution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are also linked with political movements. This reveal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changes. Therefore, mass organizations are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changes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Power transfer i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transfer, the orientation of the formation logic of May Fourth progressive societies can be roughly examined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ly, the orientation of ideological power, which mainly examines the founding of progressive socie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pread of “doctrine” in modern China. The second is the orientation of organizational power,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ese mass organizations since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The third is the orientation of social power, mainly in the process of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On the whole, the orientation of these three aspects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transmission and evolution of power transfer in the public sphere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Keywords: power transfer; May Fourth progressive societies; formation logic; implications